

# 比较·认知·诗学： 三重视野中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

——对认知诗学本土化的一种思考

晏 红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 重庆 400031)

**摘 要:** 认知诗学是西方兴起的一种立足于认知科学的文学研究范式和文学理论。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是对认知诗学本土化的一种思考, 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通过对“比较”蕴含意义的确立, 在借鉴比较文学可比性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在比较视野中探讨认知诗学进入中国后必然产生的变异和新的生成, 从而为认知诗学本土化提供一种有效的建构途径; 二是在认知视野中探寻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认知资源, 达成传统资源的激活与现代转型, 从而获取丰富的本土资源, 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本土化的认知诗学; 三是在诗学视野中以“后理论”语境的理论观念确立比较认知诗学的理论属性, 将语言和心智与人的生存方式合为一体, 从认知视角辨析中国文论资源中丰富多彩的体现隐喻性思维和感性抒发的各种观念话语, 在充分阐释并借鉴西方认知诗学思想观念及反思性理论思考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评价一切文学活动和过程, 把认知和诗学真正地统一起来, 从而以一种独具特色的汉语诗性认知特征塑造认知诗学本土化的学术品格。

**关键词:** 比较; 认知; 诗学; 比较认知诗学

## Comparison, Cognition, Poetics: The Threefold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Cognitive Poetics — A Reflection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Poetics

YAN Hong

**Abstract:** Cognitive poetics is a literary research paradigm and literary theory based on cognitive science that has emerged in the Wes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arative cognitive poetics is a reflection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poetics, which is mainly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in the light of relevant theories on the comparabil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y means of the

**作者简介:** 晏红, 男, 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

discrimi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mparis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evitable variations and new generations of cognitive poetics in China in the scope of comparison, from which an effective approac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poetics can be derived. Secondly, in the scope of cognition, this paper purports to discover the cognitive resources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a localized cognitive poetics based on the renewal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Thirdly, in the scope of poetics, by positioning comparative cognitive poetics in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the “post-theory” and unifying human existence with language and mind, this paper discriminates the rich and colorful conceptual discourses that embody metaphorical thoughts and sensitive expressions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and basing on fully interpreting and consulting western cognitive poetics and on the reflective theoretical thinking, it also attempts to reexamine and reevaluate all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processes by integrating cognition into poetics so as to shape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poetics with a unique feature of Chinese poetic quality of cognition.

**Key words:** comparison; cognition; poetics; comparative cognitive poetics

## 0. 引言

认知诗学作为一个概念源自于1983年以色列学者鲁文·楚尔（Reuven Tsur）发表的论文《什么是认知诗学》（*What Is Cognitive Poetics?*），其最初的意义并不指向现代语境中“诗学”所具有的文学理论性和系统性。不过，随着认知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意义开始指向一种立足于认知科学的关于文学的系统性理论，而这种新的理论探讨在借鉴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后日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理论，并开始拥有自己的理论建构。尽管如此，认知诗学究竟是一种专门的研究方法还是系统性的文学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正如有学者指出“认知诗学学科理论及方法论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认识不统一；学科理论不完备；研究目的缺乏独特性和统一性；重方法借鉴，轻理论建构；研究方法不够完备，偏重于语言学。”（熊沐清，2011）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不足的存在恰恰为认知诗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理论开启了极为丰富的思考与建构空间，它召唤着更多的学者投入其中，在认知的指向中对文学的本质规律及其丰富的文本和生命世界作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探讨与建构。

考察国内学界对认知诗学理论的译介与接受，可以发现3个基本特征：一是基于认知诗学作为一种学科理论发展的短暂及理论的分歧和不完备，国内学界对认知诗学的理解存在着多元性和含混性，有待进一步深入阐释和探讨；二是最早关注并译介认知诗学的主要是外语界而非文学理论领域的学者，并且大多是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文体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运用，而这难免对认知诗学已然开启出的理论空间形成一定程度的遮蔽。不过已有学者意识到这种倾向，对此进行了相

关辨析，并明确指出，“既然是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认知诗学就不仅仅是认知语言学的运用。”（熊沐清，2011）三是认知诗学本土化的诉求在该理论引进之初便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当然是一种好的学术现象，也是一种合理的学术诉求，体现出中国学者不断走向成熟的理论自觉。不过任何一种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建构工程，不仅关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探讨，更与其建构途径、本土资源及学术品格密切相关，而这毫无疑问有待学界的共同努力。

认知诗学本土化究其实质就是西方文论中国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从20世纪90年代曹顺庆先生提出“失语症”到几年前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均是对一百多年来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反思与批判。与此同时，西方学界也展开了对于理论的反思。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也是理论危机的世纪。所谓理论的世纪，主要是指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理论狂欢；而理论危机则是指这种狂欢造成的理论过剩的现象。对此，西方学界从80年代开始就进行了相关反思并在90年代将这种思考推向高潮。1985年W.J.T.米歇尔出版《反抗理论》文集对60年代以来的理论热进行反思与批判。1999年马奎兰等编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和2003年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著作在从不同角度反思批判20世纪的理论狂欢现象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特别的“后理论”景观。（余虹，2009：277）

尽管国内国外的相关反思与批判否定不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既成事实，也阻止不了各种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但是却可以为我们理解西方相关理论及其本土化提供警醒和借鉴。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为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可以作为认知诗学本土化的一种有益尝试，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对“比较”蕴含意义的确立，在借鉴比较文学可比性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在比较视野中探讨认知诗学进入中国后必然产生的变异和新的生成，从而为认知诗学本土化提供一种有效的建构途径；二是在认知视野中探寻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认知资源，达成传统资源的激活与现代转型，从而获取丰富的本土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本土化的认知诗学；三是在诗学视野中以“后理论”语境的理论观念确立比较认知诗学的理论属性，将语言和心智与人的生存方式合为一体，从认知视角辨析中国文论资源中丰富多彩的体现隐喻性思维和感性抒发的各种观念话语，在充分阐释并借鉴西方认知诗学思想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评价一切文学活动和过程，把认知和诗学真正地统一起来，从而以一种独具特色的汉语诗性认知特征塑造认知诗学本土化的学术品格。

### 1. 比较：变异与生成

比较是建构比较认知诗学的基本前提，也是认知诗学本土化得以可能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比较视野的确立，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相应的译介阐释使认知诗学

进入本土，而且使源自于西方的认知诗学相关理论观念在中国语境中得到本土化的辨析和承纳。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与发展中，“比较”的意义一直具有争议，而在这种争议中，简单地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恰恰是被质疑的。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研究理解为同源性研究，而美国学派则指向类同性研究，中国学派强调异质性。同源性、类同性和异质性的研究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所谓比较。同源性具体指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实证性文学关系，因此比较文学自然地导向国际文学关系史。类同性是基于普遍的文学规律基础的预设而指向不同国家乃至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的文学的共同性，在此基础上平行研究得以形成。异质性则是基于不同文明与文化的根本性不同而进行的求异的文化探源，必然导向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尽管这一切研究在命名中都被笼统地冠之以“比较”之名，然而不同学派所代表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差异性却是比较文学之为比较文学的关键之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跨文明的比较必然意味着译介与接受中变异的产生。对此，曹顺庆先生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可以为比较认知诗学建构提供方法论借鉴。

2006年，曹顺庆先生撰写长文明确对变异学进行了定义，即“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曹顺庆，2006）。在具体阐释中，曹顺庆先生认为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文化变异学、文学他国化以及跨文明研究共同构成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其根本特点在于以差异性与文学性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稳定而开阔的学科体系。在此学科理论中，差异性与文学性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立足点，而且也是其研究的思想与精神指向。具体而言，差异性不仅导向影响研究中接受者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变异，而且也揭示了平行研究的相互阐释中存在的基于文化及语境不同而出现的变异。文学性则立足于文学必然具有的人文主义精神色彩，超越于纯粹理论的理性思辨和符号编码的形式系统，直指人的内在生命体验与价值追求，从而将比较文学真正还原到文学作为人学的意义原点，使比较文学研究拥有人的生命情怀和精神追求，同时也体现出研究者作为主体在阐释相关理论时必然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与思考。

当然，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作为认知诗学本土化的一种尝试，其目的并不在于使其从属于比较文学。在借鉴一百多年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可比性理论的基础上，“比较”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同样重要。

《辞海》（1994）对比较的解释是：“确定事物统一关系的思维与方法。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相同与相异之点，便可以对事物作初步的分类，但只有在对各个事物的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比

较后，才能把握事物间的内在联系，认识事物的本质。”由此可见，比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具体方法，而且是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一种基本的认知策略，其本身就蕴含着认知和新的思想建构的意义内涵。

在古汉语中，“比”是一个会意字，其甲骨文的形状像两人步调一致、并肩而行。它与“从”字同形，只是方向相反。对此，《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这就是说，“比”拥有“密”所具有的两层含义：一是并列、齐同、接近、连接；二是亲近、亲和、和谐。此外，“比”本身亦含有“比较”之义。“较”是形声字，从车，交声，其本义为车厢两旁板上的横木，但在其后的使用中，却引申出另外的含义。据《高级汉语大词典》，除上述本义外，“较”主要有较量、竞逐、计较、检验、辩驳、校正、显明、彰显和正直等基本含义（杨乃乔，2002: 52-57）。<sup>②</sup>在现代汉语中，“比”和“较”合成为一个词，因此“比较”的意义便源于“比”和“较”二者共同具有的语义。从“较”的本义中，便可以引申出“比”所具有的“并列、齐同、接近”之义，而这就是“比较”作为“确定事物统一关系的思维与方法”的语义基础。具体而言，比较自然地蕴含着这样的意义，即：把两个具有相当之地位、价值等的事物放在一起，使其相互接近并进行公正公开的较量，并在较量中，通过二者的相互辩驳、相互印证，进而相互彰显和相互拥有，从而在相互连接、相互交汇中融汇为一个整体，最后抵达某种新的境界。

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正是将中西方具有相当或相似之认知特征的诗学观念及话语并置在一起，“通过二者的相互辩驳、相互印证，进而相互彰显和相互拥有，从而在相互连接、相互交汇中融汇为一个整体，最后抵达某种新的境界”，可以说这种新的境界的生成就是本土化的认知诗学，也是比较认知诗学建构追求的理论意义。当然，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必然以相关的认知资源为核心和基础，比较视野的确立只是为认知诗学的本土化提供一个具有学术合法性的有效途径，而真正的建构则有待于在比较视野中对中国传统文论里具有相当或相似之认知特征的诗学观念及话语进行激活与现代转型。

## 2. 认知：激活与转型

如果说“比较”视野的确立，意味着比较认知诗学获得了具有学术合法性的建构途径，那么“认知”视野的确立则必然指向比较诗学的学术资源。一般而言，比较诗学的概念源自艾金伯勒将“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结合起来对比较文学发展的一种判断，其意义在于既突破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束缚，又将比较文学导向人文主义的广阔前景，但在后来的具体发展中，“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被遮蔽，比较诗学被简单地理解为不同国家及不同文明间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纯理论比较的研究模式。在

某种意义上,比较认知诗学中认知视野的确立不仅是认知诗学本土化的题中之义,而且有助于对陷入纯理论比较研究模式窠臼的比较诗学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认知诗学是伴随着认知科学兴起而发生的认知转向得以诞生的,对心智的关注成为其思想核心,其基本特点在于突破传统的身心分离的二元对立思想,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成为其基本原则,在强调人的具身体验和体悟的基础上,认知诗学以其独特的认知视野探究文学的基本规律和理论特征。

中国文化是一种心性文化,中国文论自然也打上心性的烙印,具身体验和体悟是其重要特征。虽然中国文论的这种特征与西方文化具有异质性,但在对心智的关注与表达方面却和认知诗学“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具有相似的指向性。基于这种指向性,在认知视野中,我们可以使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相关资源得到一种新的激活,并实现其现代转型,从而使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成为可能。一个典型的范例即是学界关于“风骨”的论争。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风骨”的理解众说纷纭。黄侃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与此相反的意见则是:“‘风’就是文章的形式;‘骨’就是文章的内容;而且‘骨’是决定‘风’的,也就是内容决定形式的。”也有人认为风骨“既是形式也是内容,在心为气志,发言就形成‘风骨’”各种说法不一而足(刘勰,1994:61)。

风骨是中国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刘勰是具体论述“风骨”的第一人,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刘勰是这样描述“风骨”的:“夫翬翟备色,而翮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在这里,刘勰用了三种鸟的意象来具体描述“风骨”的特征,即“翬翟备色,而翮翥百步,肌丰而力沈”,这是没有风骨的翬翟形象,“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这是有风骨的鹰隼形象。在这里风骨代表力量与气势。不过最理想的形象则是凤凰,即“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既有美丽的文采,又有力量与气势,落实到文章上就是“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意与辞皆统摄于风骨之中(曹顺庆、马智捷、韩天琪,2019)。

在认知视野中,其实这样的争论是可以避免的。根据认知科学理论,“风骨”的发生原理是具身认知,即人们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获得关于“风骨”的印象,然后在心智中形成相应概念,并用“风骨”这一词语去表征它,从而获得了作为概念的“风骨”,意指力量与气势,这种意义来自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这三种鸟的具身体验与想象,然后在论述文章特征时赋予其特定的审美意义。其实“风骨”不仅运用于文章的论述,而且也体现在人物品评和书画点评中,如“旧目韩

康伯，将肘无风骨。”（《世说新语·轻诋》），意思是说韩康伯臂肘肥硕似肉鸭，软塌塌没有刚健气质，此处的“风骨”就是指通过具身认知感受到的一个人的形貌骨骼所体现出的刚健有力的精神品格。在书画点评中，晋代卫夫人《笔阵图》中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在这里，“骨”“肉”“筋”均来自于日常的具身体验，但是在具体运用中则被赋予了体现书画线条力感与质感的美学特征，可以说是典型地体现了作为认知诗学基本原则的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这样就产生了认知语言学所说的“概念整合”，即意指“形貌体态”的概念空间与喻指“文体风格”的概念空间整合为一个合成空间。经过认知视野中的辨析后，作为中国文论范畴的“风骨”就成为一个具有认知诗学理论特征的合成概念。

尽管认知诗学诞生之初仅仅是指一种关乎诗歌语言与形式或批评家所作评论的一种跨学科的文学分析方法，其产生背景一方面与认知科学的兴起所带来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认知转向（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楚尔对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不满有关。在他看来，20世纪文学批评存在一个严重的不足，即“批评者们沉湎于文学文本的效果，却难以把这些效果与文本结构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虽然有一些分析学派和结构主义的批评家在描述文学文本的结构方面做得很出色，但他们对这些文本对人的意义却不甚了了，或者，他们所感知到的效果难以解释清楚。相比之下，认知诗学提供的认知理论可以系统地解释文学文本结构与效果之间的关系”（熊沐清，2011）。

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其中的《时序》《物色》《才略》《知音》和《程器》5篇可以说都与具体的文学批评有关，特别是《知音》篇更是在纯粹阅读接受的层面，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形象生动地阐明了文学效果与文本结构的内在关系。在《文心雕龙》中，作为文学批评概念的“知音”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认知特征，其本义是指懂得音乐，来自于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的美好故事。当把其运用于文学批评时，其意义的发生原理就是具身体验，作为心灵相通的音乐欣赏化而为善于鉴别文学的文学批评。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而“沿波讨源”之成为可能，正是在于观文者于丰富的具身体验基础上产生了内在于心的真切体悟，即“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刘勰，1995: 61）

在认知视野中，这种“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文学批评就是典型的具身认知，与认知诗学关注的“心智”问题直接相关。当然，中国文化

的心性特征在表达相关的心智问题时，强调意会，正如欧阳修所言：“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梅圣俞诗集序》）“心之得者”为什么“不可以言而告也”？北宋诗人杨时说得明白：“诗极难卒说，大抵须要人体会，不在推寻文义”（《龟山语录》）。按照认知诗学的理解，因为这种“心之得者”是审美主体“体会”而得，而“体”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具身体验，具有独特性，个体与个体之间绝不雷同，因而主体甲得出的“体会”就绝不会与主体乙的“体会”雷同。另一方面，这种超越理性的“体会”实质上既有理性的成分又不全然是理性的，它同时是某种特殊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具有不稳定性 and 模糊性，难以形成明晰的概念。从认知的角度说，言说的东西必然是概念化了的知识，没有完成概念化的知识就不能清晰地表述出来，所以难以言说。

考察中国文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范畴，相关的认知资源可以说丰富多彩。当然，作为“资源”，它们可能还只是一种有待建构的比较认知诗学理论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如果我们在认知视野中对这些资源细加梳理和辨析，就可能将其进行“认知改造”，或者通过“认知转型”和“认知升级”，使之具有认知诗学的理论品格，从而可以将它们纳入认知诗学的学科理论范畴，成为有待建构的比较认知诗学的一个部分，也成为长期以来学界讨论的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也是认知诗学本土化的一项成就。

### 3. 诗学：理论反思与汉语性回归

尽管西方学界对于认知诗学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文学研究范式还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的文学理论并未达成统一认识，国内学界亦是各执一端众说纷纭，但考察其发展倾向，认知诗学已开始走向系统性的文学理论，因此作为认知诗学本土化一种尝试的比较认知诗学的目标指向自然应该是一种现代理论形态的诗学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语境中，经过了20世纪西方理论狂欢的冲击之后，任何理论的建构都不再只是对某个领域或问题的简单思考，而必然拥有一种特别的超越性意义指向。乔纳森·卡勒在1997年出版的《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中，对现代形态的“理论”特点进行了如此界定：“（1）理论是一种在原学科之外产生影响、跨学科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性的和推测性的——它试图揭示出被我们称为性、语言、书写、意义或主体的东西中包含了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判，是对一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的批判。（4）理论是反思性的，是对思想的思想，它对我们理解事物的意义、在文学和别的话语实践中所使用的范畴提出质询。”可以说，理论的反思性就是现代理论的本质，对此，德里达明确指出：“在反思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中，反思的时刻也是回到反思条件的时机，仿佛凭借一种新的光学器械，人们可以最终看见眼光似的，不仅能看到自然风光、城市、桥梁与深渊，还能看到看本身。”（转引自余虹，2009: 280）

正是从理论的反思性出发，比较认知诗学的建构就不仅仅是对西方认知诗学思想观念的译介阐释和移植运用，而是在对一百多年来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反思与批判中，找到其理论建构的意义元点，既通过相应的理论反思“看到看本身”，也在具体的分析阐释中确立属于自己的“看本身”。

20世纪90年代曹顺庆先生“失语症”观点的提出固然是指向“语言、语体层面的译体化和知识谱系的中西切换”造成的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形态的全面西化，但其更实质的意义却是对“文化建构上的从失语而失家”的忧虑与批判。在生存论意义上，所谓“失家”就是说失去了与我们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内在相通的、发之于独特生存领会的精神表达和价值建构，正如有论者所言“从世界文化发展来看，‘失语症’从‘存在论’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认知理性的猛然斥责也是对世界近现代文化建立在科技飞速发展之上的‘认知理性崇拜’的猛烈抨击。”

（陶国山，2020）人是语言的动物，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水库，也是一个民族生存方式的体现。基于此，汉语性在这里就不只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概念，而具有一种特别的文化学意义，作为一种语言的汉语就不只是指表达层面的语词含义，而是指以语言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建构，“它以语体形态为核心，含纳着思维方式、体验结构、知识形态、价值精神，含纳着与精神内在相通的对民族独特生存之域的穿透、表达和照耀，以及由此而来的独特文化建构”（曹顺庆，2000: 215）。

一般而言，在语言对世界及人的生存方式的建构上，西方注重理性逻辑，强调求知求真，而中国则立足诗性隐喻，指向体悟体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隐喻的语言建构却是最源始也是最有原创性的，因此，对这两者的传统估价要颠倒过来……在此，‘诗’的研究不再是传统话语分类基础上的文体研究，而是对一种源始的、基础性的语言样式和思维样式的研究。”（余虹，1999: 94）

文学是人学，有什么样的人的生存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表达，而诗学则是以其特定的理论形态不仅探讨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形式的艺术规律，而且也指向对人的生存方式的精神关怀。中国文化是一种心性文化，也是一种诗性文化，其独特的“心性”与“诗性”在语言层面就体现为具有独特诗性隐喻特征的汉语性。考察中国传统文学，我们会发现“汉语古典诗词中有一些经常出现的词语/意象，事实上许多汉诗的基本情绪和格调就是由这些词语/意象所构成，比如烟——烟雨、烟波和寒烟，比如月——缺月、残月和江月，比如柳——柳絮、柳色和杨柳，比如梦——梦断、梦破、幽梦、梦魂，比如扁舟与楼台，青江与翠微，踪迹与怀古，思忆与悼亡……那些沁入心底的‘诗语’几乎都是一些最简单、质朴、入微的汉字，由这些字构成了汉语诗意的一个极单纯透明的世界”（吴兴明，2000: 218）。

这个“极单纯透明”世界的实质体现出的就是充满诗意的人的生存方式。在

中国传统文学中，中国诗人以汉语独具特色的诗性隐喻建构了一个真正的文学与生命世界。可以说，这种诗性隐喻的建构就是比较认知诗学要确立的“看本身”，而从认知视野对其的分析阐释则在反思性的理论视角一方面“看到看本身”，另一方面也使体现汉语性诗性隐喻的“看本身”得到凸显。

认知诗学是一种新兴的诗学，虽然在其诞生与发展过程中，“诗学”的理论实质及学术品格并未得到全面的阐释与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因为受到认知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束缚，偏重于文体学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与文体学无法进行区分，甚至等同于认知文体学，然而，诗学之为诗学，必然有着其作为系统性文学理论的理论担当，不仅具有在方法论意义上解读文学的有效性，而且还应该拥有在美学甚至哲学层面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认知诗学的发展，已有学者将认知诗学的视野拓展到普遍性的文学理论问题，如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 2002: 8）在其《认知诗学导论》的前言中就明确表示“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诗学逐渐含有‘理论’或‘系统’之意”。同时，他在此书中对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功用、人物类型以及文学的基本范畴如摹仿、文本肌理、话语、意识形态、情感、想象等进行专章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本肌理：关于阅读的认知美学》一书中不仅讨论了移情、身份认同、伦理等较新的文学论题，而且还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概念“认知美学”。这表明，认知诗学已然超越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文体学研究的一般讨论范围，走向一种真正的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熊沐清，2011）

当然，作为认知诗学本土化的比较认知诗学建构，不仅要采取这种系统性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而且还应该在充分译介阐释西方认知诗学最新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诗学传统，在诗学视野中以“后理论”语境的理论观念确立比较认知诗学的理论属性，将情感作为文学与认知的交汇点，以认知诗学所依托的认知语言学及认知心理学为基础，将语言和心智与人的生存方式合为一体，通过认知诗学对具身体验和体悟的情感特征的强调，一方面把认知和诗学真正地统一起来，使认知诗学从当代西方文论的理性求知和逻辑求真取向回归到人的知觉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则从认知视角辨析中国文论资源中丰富多彩的体现隐喻性思维和感性抒发的各种观念话语，在充分阐释并借鉴西方认知诗学思想观念及反思性理论思考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评价一切文学活动和过程，从而以一种独具特色的汉语诗性认知特征塑造认知诗学本土化的学术品格。

#### 参考文献：

- [1] Stockwell, P.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2] 曹顺庆. 论文学批评中的汉语性 [C]// 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3] 曹顺庆，李卫涛. 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 [J]. 复旦大学学报，2006 (1): 79-83.

114.

- [4] 曹顺庆, 马天琪, 韩天琪. 中西文论中的力量之美 [N]. 中国科学报, 2019年9月25日.
- [5]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1989年缩印本) [M].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 [6] 刘勰. 文心雕龙 [M].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7] 陶国山. 从“失语”到“走出去”: 中国文论的当代建构与影响 [J]. 中国文学批评, 2020(2): 52-61, 158.
- [8] 吴兴明. 汉语批评的一个维度 [C]// 曹顺庆. 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 [9] 熊沐清. 多样与统一: 认知诗学学科理论的难题与解答 [J]. 外国语文, 2011(1): 33-38.
- [10] 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1] 余虹.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2] 余虹. 文学知识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杜 坤